

大家谈人生

只希望成为一座桥梁

黄天骥

去年,中山大学庆祝百年校庆,我也进入“90后”的高龄了。我这一辈子,从17岁起,就在中大学习、工作和生活。康乐园翠绿的草坪、苍劲的榕树,见证了我在这里从学到教的人生。

我出生在广州市西关,祖父从商,在广州有一些房产。曾外祖父梁普照曾是赴美留学的幼童。外祖父梁启英是詹天佑的学生,任粤汉铁路建筑工程师,抗战期间,他曾领导抢修被日机炸毁铁路和机场的工作。舅父梁赞勋青年时期参加革命,是新中国的航空工程专家。祖父一直要我以舅父为榜样,按理我应多少有些理工科的遗传基因,但是,我的父亲上世纪30年代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(现中山大学)中文系,这便直接影响我走上学习文科的道路。

抗战期间,我家的房产被日机炸毁,有的亲属被日军杀害,我们到澳门避难,生路无着,流离失所。不久,任中学语文教师的父亲染上霍乱,缺医少药,两天即告病逝。早在我的幼年时代,心中就埋下了爱国爱家、渴望祖国强大的思想种子。

父亲去世后,遗下了几个书架的线装书,包括全套《十三经注疏》、《杜诗镜铨》和一些诗集词集,以及亚米契斯的《爱的教育》、厨川白村的《苦闷的象征》及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红楼梦》等书籍。《唐诗三百首》、《白香山词》、《成语考》之类,上小学时,祖父便要我背诵,还要我熟读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。《岳阳楼记》豪雄瑰丽的文字,让我对古代文学产生了兴趣,特别是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名句,深深镌刻在我的脑子里,也希望自己长大后能成为对国家、对人民有用的人才。

抗战胜利后,我在广州南海中学就读,这所中学以培养文科学生著称。1949年广州解放,我写了一篇名为《重逢》的小说,写亲戚的女儿抗战期间与家人失散,后在人民政府协助下一家团聚的故事。我向广州日报投稿,被采用刊登。这一来,我的学文学当作家的兴趣大增,更重要的是,我对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有了全新的认识。

1952年,我考进了中山大学中文系。课余时间,都在图书馆度过,阅读专业书籍,也乱翻读书架上的理科杂志。那时,罗克江教授给我们讲授唯物辩证法,让

我深知中文系学生既要具有形象思维,也要具有逻辑思维。中大中文系的课程安排既注意专业教育,也注意通识教育,到了大四,还必修逻辑学和教育学,要到中学里进行3个月的教学实习。毕业后,我留校任教。

我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批学者。在中大,我经历过风风雨雨,和学生一道下乡下厂,学农学工。和工农大众接触,对了解国情民情很有帮助,也由此更加渴望祖国富强和人民幸福。

老实说,我在康乐园里当教师,夙夜不懈,很平凡。对我来说,最重要的,是从老一辈老师的身上,知道了什么叫师德、师风,知道要努力完成作为人民教师的职责。

记得大一时,詹安泰教授给我们讲授“中国文学史”,我也经常到他府上请教。詹老师是著名的词学专家,知道我喜欢唐宋词,便经常拿出他自己的作品,逐字逐句告诉我他是如何遣词造句,实际上是手把手教我学习有关词的创作方法。

有一次,他和我讨论韦庄的《菩萨蛮》,我大胆地提出和他不同的想法。詹老师想了想,欣然认可,并且称赞我“初生之犊不畏虎”,能独立思考。詹老师的胸襟和做法,让我深受教育。后来我在指导研究生时,要求学生对待学术问题要敢于“胡思乱想”“胡说八道”,要敢于和老师有不同的意见。这实在是从詹老师对我的培养中受到的启发。

詹老师是潮汕人,他常请我喝“工夫茶”。起初,我仰脖一饮而尽。他笑对我说,饮“工夫茶”,应细细品啜。斟茶时,要把开水从高往下注入,又要均匀地向几个小杯点滴余沥。他告诉我:做学问也应如此,应仔细斟酌,又要高屋建瓴,要点滴不漏地搜集资料。这形象的教导,让我终生难忘。

在詹老师的影响下,我立志研究诗词。在大三时,我不知高地把《陶潜作品的人民性特征》的论文投给《文学遗产》,竟然被录用刊载。按照我的兴趣,应该对诗词研究作进一步的发展。但是,一次胡闹的行为,竟让我转变了学习的方向。在第三学年,著名戏剧家董每戡教授,给我们讲授“中国戏剧史”。他授课精彩绝伦,但姿态特别,总是半弯着腰,大摆着手,在讲台上擦一擦鼻下的胡

子,才开始讲课。有一天,董老师迟到了。我顽皮成性,灵机一动,跑到教室门口张望,见走廊上没有人影,便回转身来,学着董老师走路的姿态,走上教坛。同学们大笑,我正在得意,回头一看,才发现董老师站在教室门口。我尴尬得很,赶紧溜回座位,也知道犯了错误,忐忑不安。下课后,董老师叫我留下来,我更加紧张,心中暗说“我死也!”谁知他对我说:“我看你模仿力很好,不如跟我学习戏曲吧!”我赶紧点头,既尴尬,又感动。想不到老师胸怀如此广阔,他不仅原谅青年的调皮,还从中看到学生在某方面的可塑性,因材施教。从此,他给我开列许多研究戏曲的书目,辅导我研究有关《桃花扇》的毕业论文。我毕业后留校工作,从事元明清文学史的教研工作。董老师让我到广州的剧团实习,要求我参加编导工作,要把舞台表演和文学剧本结合起来学习,才能对古代戏曲有所理解。

后来,董老师离开中大,转由王季思教授指导我的学习。王老师也是研究戏曲的专家。那时,他承担组织编写《中国古代戏曲选》教材的任务。王老师知道我好动,说我屁股尖,坐不住,便刻意选取版本较多、校注繁多的剧目给我承担,意在磨练我的耐性,要我认真学会爬梳文献。前后三年,我完成了任务,初步掌握古籍整理的知识,也真磨平了我的屁股,让我养成“板凳坐十年冷,文章不写一句空”的习惯。

凡此种种,让我在求学和担任教师阶段,便从老师身上,懂得怎样当好学生、怎样当好人民教师。

王老师逝世后,由我主持中大戏曲团队的学习和工作。我们继承和发扬王老师提倡的团队精神,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中,敢于啃硬骨头,突破重围。2009年,我和康保成教授共同主编出版了《中国古代戏剧形态研究》,全书约90万字。2010年,我作为首席专家,和黄仕忠教授一起,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《全明戏曲》,全书约5000万字,在2017年批准结项。其中《全明杂剧》部分约600万字,准备出版。这些“传帮带”的项目,都是师生团结友爱,互相支持的成果。

同时,我还感悟到,做学问不必拘泥一格,要敢于打通思路,提出新的见解。

我还出版了约有50万字的《周易辨原》。朋友们对我是“破门而出”。其实,我只是把研究传统文化的门,开大了一些而已。同时,作为岭南人,我还写了一些有关岭南文化的书,这也和我想要打通专业的研究并行不悖。

在中大任教期间,我意识到自己在中学时期,理科成绩不佳,影响了逻辑思维的能力,便着意向理科老师求教。像和同辈的数学系林伟、吴兹彦教授,常常讨论数学对“美”的理解;还和生物系的江静波老教授,成为忘年之交。特别是和物理学家李华钟教授,过从甚密。记得有一次,向李教授请教物理学中有“场”的问题,经过一夜的讨论,让我在文学研究中理解“意境”的涵义,豁然开朗。后来的《诗词创作发凡》一书,我用了长达5万字的篇幅,讨论诗词“意境”的问题,这正是受到了物理学中引力波和“场”理论的启发。

作为高校教师,首要的任务,是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引下,把学生培养成德才兼备的人才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我发现中学考试过于频繁、学生疲于奔命,一旦考上大学,普遍会放松学习,这势必影响以后的进步。以中文系的学术而论,毕业后,多会到报刊或各种机构任职,这都离不开文字工作。因此,必须过好写作关。在我担任中大中文系主任期间,从1986年开始,规定大一的学生在一年内缴纳100篇作文,每篇字数在1000字以上,必须是记叙文和议论文,还规定每一位教师负责指导三两名学生的写作。起初,学生们叫苦连天,其后发觉受益匪浅,这段写作经历成为校友们美好深情的回忆。“中大中文系学生能写”,也成了许多用人单位的共识。

其实,“一百篇”的意义,不仅是写作训练,更能提高学生思想修养。学生们写完家庭和中学校友熟悉的题材以后,势必会观察和关心社会的问题。这一来,指导老师便可从中了解学生对现实的情感和思想状态。这是老师教书育人、做好思想工作,让师生之间更加团结友爱的有效方法。

我在中山大学从事教育工作长达近70年,出版过《黄天骥文集》十五卷,退休以后,也还能坚持科研工作,2023年出版了《唐诗三百年》、《宋词三百年》亦将面世。我只希望能成为一座桥梁,以期帮助后一辈热心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学者走向更高的阶梯。

中山大学“中文堂”落成之际,我写了一副对联:“领百粤风骚开一园桃李,揽九天星斗写千古文章”。由衷期望学术之花盛开在岭南和祖国的大地上。

出事。

还有相反的,别人热情地请你吃,隐藏着各种图谋,项羽请刘邦吃的“鸿门宴”就是如此。“染指”和“鸿门宴”的危险有一个共同点:都是吃别人的引来了麻烦。

社会在进步,对于大众来说,吃饱早已不是问题。这时主人家请吃饭,往往要往吃好、吃乐、吃雅上去安排。如果仅限于此也没啥关系,但是——别忘了,有的主人正盯着客人性命之外的“别的东西”呢,比如考试录用、职务升迁、工程招标、项目审批、行政越权、偏袒执法,等等,是特殊身份和特权。于是,有请客的主人就悄悄地给客人送上食物之外的东西,比如金银财宝等。而有些客人呢,或许本身就“染指”主人的这些东西,于是“稀里糊涂”地“吃请”。结果呢,除了吃出了“三高”,还吃出了“腐败”。“腐败”不伤性命,却伤害政治生命、事业生命。这是危险的吃。

为免误解,需要强调一下:吃的危险并不普遍,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候,完全可以放心地吃。放心是必要的,防范也是必要的。防范什么,前面讲得很清楚了。怎么防范?我想就是清清白白地吃,正正常常地吃,健健康康地吃。

有的人会说,我自己的身体自己负责,不需要你来提醒。不过,有些人哪怕是自己的身体,如果他的职业、他的身份与国家的利益、人民群众的利益、法律的公平公正密切相关,而他又容易把这些当作自己的身体随意糟蹋,那么不仅要提醒,还要让党纪国法来处置,决不能任由他胡吃海塞。

因此,最好的办法仍然是自己管好自己,管住这张好吃的嘴。

金台随感

往事

李琦

或许在少年时

我已开始显现了写诗的端倪
五十多年后,我的同学依然记得
我曾编出一些幼稚可笑的韵文
包括嘲笑个子最高的“竹竿”女生

半个世纪后,伙伴们重聚
百感交集,互相端详
当年的浆果,如今都变成了蜜饯
高个子女生面容慈祥

她远渡重洋归来
早已原谅了我当年的荒唐

她使劲地拥抱我,泪水盈眶
她说,数十年移居异国
听到母语的时候,已为数不多
离群索居,安静而寂寞

她常常会觉得,已被世界遗忘
她说,总能在梦里回忆起往昔
故国北方,那种天真的快乐
操场的角落里,我们围成一圈
对着地上蚂蚁,不厌其烦:
清脆的汉语那么动听——
小蚂蚁,快快爬
你妈喊你快回家

念黄州

苏

北

南

中

东

西

北

南

中

东

西

北

南

中

东

西

北

南

中

东

西

北

南

中

东

西

北

南

中

东

西

北

南

中

东

西

北

南

中

东

西

北

南

中

东

西

北

南

中

东

西

北

南

中

东

西

北

南

中

东

西

北

南

中

东

西

北

南

中

东

西

北

南

中

东

西

北

南

中

东

西

北

南

中

东

西

北

南

中

东

西

北

南

中

东

西

北

南

中

东

西

北

南

中